

艱難的「二次革命」

一、「宋案」黑幕的偵破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宋教仁因勃朗寧手槍子彈彈毒發作，不幸逝世。事隔一天，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就在迎春坊、文元坊等處緝獲主使刺宋的應桂馨及兇手武士英等人，並搜獲兇器及其他罪證一批，很快使「宋案」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一般說來，暗殺案件不易偵破，尤其是政治謀殺案更是如此，而「宋案」何以破案如此迅速呢？

原因一是，國民黨人重視並竭力進行偵破；二是，取得了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和閘北警察局的協助。

國民黨領導人十分重視「宋案」的偵破一事，他們在宋教仁逝世的當日，黃興、陳其美就立即聯名致函上海公共租界總巡捕卜羅斯和閘北警察局長龔玉輝，請協助緝拿刺宋真凶，應允「如能拿獲正兇，即賞銀一萬元，以為酬勞」，「查清全案，即刻給銀，決不食言」。陳其美還專門委派國民黨員陳惠生等參加「宋案」的偵破緝凶工作。賞格一出，租界總巡捕房

和聞北警察局迅即分派多名得力偵探，進行認真的查緝。

就在同一天，國民黨人張秀泉報告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情況：他的衛兵鄧文斌在案發前數天曾被收買行刺某人，鄧文斌沒有答應。經瞭解，原來鄧文斌與演戲的小連勝及字畫商王阿發相熟。某日，王阿發告鄧謂：刺殺一個人可得千元，又有官做，如萬一被捕入監獄，他們還保證不會出事，並徵詢鄧願。根據這些情況，巡捕房等，立即佈置追查王阿發，以便進一步弄清全部案情。

三月二十三日晨，鄧文斌在法租界馬德里六〇九號找到王阿發後，假邀王晚上到三馬路一旅館中敘事。下午五時許，王阿發依約來到，張秀泉、陳惠生等說明原委，並曉以利害關係，勸說其認清形勢，說明詳情。王阿發受國民黨人啟發後，認識到宋教仁是愛國的革命黨人，願意說明事情的原委，並表示可以出來作證明人。據王說，上個月他到文元坊應公館去做字畫生意時，有位「應大人」問他是否認識有大膽的朋友，若有的話可以帶來相見。王於是帶了鄧文斌去應公館。其時，「應大人」取出一照片，說要刺殺這個人，問鄧敢不敢去幹。當鄧表示不敢幹後，應立即厲聲交代說：「你不幹，但不許說出去，如果說了就要你的命。」王阿發還說記得那張照片背後有用鉛筆寫的三個字：宋漁父。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卜羅斯得知這些情況後，即電告法捕房於當晚派出巡捕同國民黨人陳惠生等，趕到文元坊應公館進行搜查。該公館的主人就是王阿發所說的「應大人」應桂馨。此人系清末上海一大流氓，捐官候補知縣。清廷垮臺後，他一度混入上海軍政府當諜報科長，

又到南京臨時政府衛隊混過。後因行為不端被革職，返滬組織流氓團體共進會，投靠袁世凱，由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保薦，當上了江蘇巡查長。當時，應桂馨不在家中，依照其家人透露的去向，一部分巡警在迎春坊妓院，捉住了正陪某少將飲酒作樂的應桂馨。武士英當時不應公館出事，急忙回來報信，一進公館即被扣下。陳惠生等人在應公館搜查中，搜到手槍兩支、函電等文字罪證多件。他們遂將應家嫌疑人犯十六人帶回法租界嵩山路捕房收押候審。稍後，其他幾個同案犯也相繼落網。

「宋案」正兇緝獲後，案情真相很快大白。經審訊，武士英對受應桂馨指派、帶凶徒四人至車站行刺宋教仁一事，供認不諱。應公館搜獲的大量密函密電，證明應桂馨是坐鎮上海組織暗殺宋教仁的主使者，而從其與袁世凱北京政府內務總長趙秉鈞、秘書洪述祖等人的來往電中，進一步證明「宋案」最大的主謀元兇是趙秉鈞



一九一三年四月，國民黨經過艱難的調查後，確認「宋案」的主謀是袁世凱。圖為當時的報導。

和袁世凱。這樣，袁世凱這個大陰謀家的猙獰面目就徹底暴露了。

「宋案」的偵破，其意義遠不止在於懲辦正兇以祭宋教仁在天之靈，更主要的在於通過公佈「宋案」真相的七八件罪證函，給國民黨人和全國人民上了生動的一課，徹底將袁世凱奸詐兇殘和賊喊捉賊的醜惡面目公諸於天下。

正是以「宋案」為契機，大多數國民黨人從「勝利」和「南北合作」以及「政黨內閣」與「議會政治」的幻夢中震醒過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革命派從此消除了對袁氏的幻想與妥協心理，重新組織力量，拿起武器，進行反對袁世凱專制統治的鬥爭。從此，孫中山又踏上了堅決武裝討袁的戰鬥歷程。從這點來看，「宋案」的偵破起了警鐘木鐸的作用，它喚醒國民黨人為捍衛共和而戰，以竟辛亥革命未完之功。

二、「二次革命」的爆發和失敗

刺殺宋教仁是袁世凱發動內戰的信號。「宋案」發生後，袁世凱便秘密下動員令和大借外債，決心以反革命武力消滅南方的國民黨力量。袁世凱和一切反動派一樣，「自己首先使用暴力，發動內戰，『把刺刀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在北洋軍隊急劇膨脹的同時，黃興卻致電袁世凱極力表白無意「戀據要津」、「擁兵自衛」，說什麼「吾輩十餘年，兢兢業業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圓滿之幸福。今目的已達，掉臂林泉，所得多矣」。大裁民軍，只剩下三萬軍隊。而袁世凱敢於發動內戰，也是大得帝國主義

財政支持的。四月二十六日袁世凱不惜出賣國家權益，以鹽稅和海關稅擔保，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了二千五百萬萬鎊的所謂「善後大借款」合同，以擴充反動軍隊，準備對國民黨用兵，鎮壓革命。

關於這次借款，列寧曾指出：「中國的新借款被用於反對中國的民主派：『歐洲』擁護準備實行軍事獨裁的袁世凱。」；「整個歐洲的當權勢力，整個歐洲的資產階級，都是與中國所有一切反動勢力和中世紀勢力實行聯盟的。」，「先進的」歐洲，掠奪中國，「幫助中國民主、自由的敵人」！³¹

「宋案」調查和袁世凱備戰期間，中華民國第一屆正式國會於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在北京召開了。國民黨議員占了壓倒優勢，參議院正副議長張繼、王正廷和眾議院委員長林森都是國民黨人。資產階級右翼議員、老立憲派湯化龍、陳國祥佔據了眾議院正副議長的席位。全部議員大多是三十幾歲年輕人，四十幾歲的較少，五十歲以上的更少，六十歲的只有三人。他們大多數被稱為「新派」人物。袁世凱認真對付了這些「新派」議員，一方面授意梁啟超、湯化龍等老君主立憲派等組成進步黨，形成對抗國民黨的國會中第二大黨；另一方面對國民黨議員採取分化政策，金錢收買和武力威嚇是他兩大手段。

未經國會通過的非法大借款案和政治謀殺的「宋案」真相發表後，國民黨議員無不憤慨，

紛紛攻擊袁世凱政府。和國民黨議會鬥爭相配合，四月十三日國民黨上海交通部於味蓴園召開了宋教仁追悼大會，上下午參加者達四萬人。會上許多人憤怒地痛斥反動殘暴的「官僚派」，其中吳永珊（吳玉章）指出：「政治革命非引起全國民之注意，不能成功。宋先生之被害，實為刺激國民政治革命之精神之機會。」追悼宋教仁的悲壯行動，形成一個頗有聲勢的抗議鬥爭。

但是，從整個局勢看來，一向妥協的國民黨，已經不能有力回擊北洋軍閥集團了。國會內進步黨議員則站在袁世凱一邊，提出對時局的主張：一、擁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為唯一候選人；二、大借款不能反對，只可監督用途；三、「宋案」靠法律解決。國會內部有袁世凱的御用進步黨的破壞，國民黨議員又相當多的是貪圖利祿權勢之輩，這使國會不可能有所作為。梁啟超在《國會之自殺》一文中說：「八百員顛，攢動如蟻，



「宋案」的發生驚醒了孫中山的建設夢，孫中山不得不終止在日本的考察，提前回國。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回到上海。圖為當晚與黃興等人商討處理「宋案」及發動「二次革命」問題時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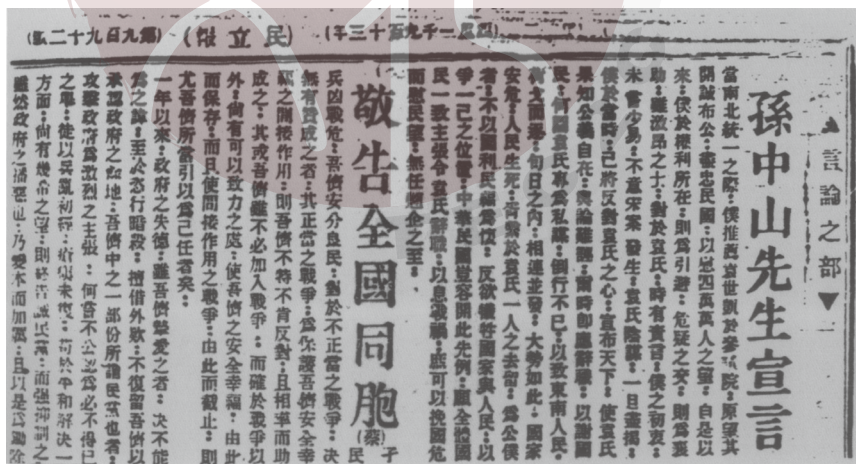
洵洵擾擾，莫如所事。……法定人數之缺，日有所聞，休會逃席之舉，實成故實。幸而開會，則村嫗罵鄰，頑童鬧學，框攘拉雜，銷此半日之光陰，則相率鳥獸散而已。國家大計，百不一及。」他的那位尊師康有為，身在國會之外，也著文《國會歎》攻擊國會，「議長逃於室，議員鬧於堂，笑類小兒，亂暴類無賴」。他們固然是從右邊惡意攻擊，但多少也暴露了「議會政治」的破產。國民黨在議會中沒有能成為鉗制袁世凱的重大力量。在袁世凱種種利誘、威嚇和打擊下，張繼、王正廷等一部分議員逃往南方，大部分國民黨議員被分化和收買，國民黨第一大黨的作用幾乎全部消失。在京國民黨議員相繼組織了政友會俱樂部、相友會、癸丑同志會、國會商權會等小團體，他們藉口「法律倒袁」，賴在北京國會裡，希望在北洋軍閥刺刀下與進步黨分沾一些利益。國會已完全被袁世凱控制了。

袁世凱和一切反動頭子一樣，是革命者不可缺少的反面教員。在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從日本趕回到上海的當晚，就在黃興寓所及時召開國民黨一些骨幹開會，商討對策。他認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為袁世凱是總統，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³²他提出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在南方各省組織討袁軍，立即興師討伐，保衛新生的共和國。同時又揭露了袁企圖通過借款發動反革命內戰的陰謀，宣佈借款違法，中國人民絕對不予承認。他還準備組織全國公民大會，提出救亡口號。很多報紙、

省議會和群眾團體亦群起響應，組織拒債會，反對袁世凱獨裁賣國的勾當。國民黨地方實力派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以及湖南都督譚延闓也致電反對大借款、抨擊「宋案」。孫中山決心立即興兵討袁，重新舉起民主革命的旗幟，挽救垂危的「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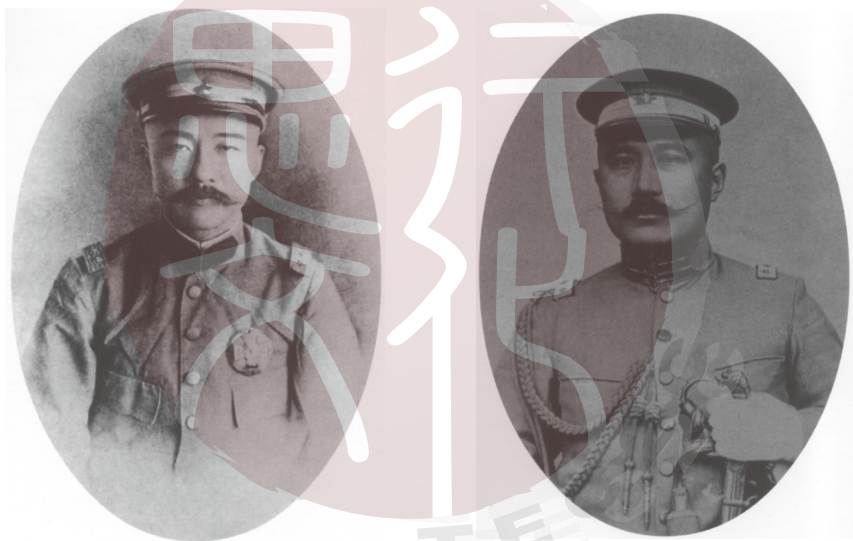
但是，孫中山堅決以武力討伐袁世凱的主張，遇到了國民黨反袁軍事準備未完成的不利情況，因而開始時並沒有得到國民黨上層領導人的普遍贊同。黃興與大部分與會者則對武裝討袁缺乏信心，堅持要通過法律程式，查明真相，黃興對孫中山說：「民國已經成立，法律非無效力」，主張「法律解決」；³³胡漢民又以「時機未至」拒絕首先在廣東宣佈獨立；陳其美等也以沒有海軍防守，「上海地方小，難與抗」，反對先在上海舉兵獨立。這

33 《致黃興書》，《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九十六頁。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宣言，號召討袁。

時，在討袁問題上，不僅國民黨主要領導人之間存在嚴重分歧，就是國民黨各省實力派也各懷心腹事，無法統一起來。所以，儘管孫中山一再敦促，多數革命黨人仍猶豫不決。他們的遲疑不決和忍辱退讓，使袁世凱的氣焰益發囂張。就在國民黨內意見分歧、逡巡不進之時，袁世凱仗著手中的軍事實力和帝國主義的支持，於五月六日竟以政府名義下了一道「除暴安良」令，矛頭直指國民黨。北洋將領張牙舞爪，紛紛通電，誣蔑國民黨「危害民國」，表示已「枕



一九一三年六月中旬，袁世凱下令免去柏文蔚、譚延闓、李烈鈞、胡漢民擔任的皖、湘、贛、粵四省都督職務，派兵南下。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奉孫中山命在江西湖口起兵討袁，「二次革命」爆發。圖為李烈鈞。

一九一三年五月一日，安徽都督柏文蔚率先通電反對「善後借款」。五月七日，又與湘、贛、粵省都督譚延闓、李烈鈞、胡漢民聯名通電反對借款。圖為柏文蔚。

戈待命」。一切準備妥當，二十日袁發表「傳語國民黨人」的長電：「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³⁴果然，六月九日藉口李烈鈞反對借款，不「服從政府」，免其江西都督職。接著又解除了胡漢民、柏文蔚的廣東、安徽兩省都督職務，並調集兵力，向南方的國民黨人發起武裝進攻，進逼九江，妄圖一舉消滅國民黨人。

南方革命黨人在袁世凱的北洋軍已把屠刀架到脖子上，為大勢所迫，才接受孫



七月十八日，陳其美在上海通電討袁，任討袁軍總司令。圖為陳其美。



湖南都督譚延闓。

中山武力討袁的正確主張，不得不起兵應戰。

七月上旬，「宋案」發生已經三個多月以後，孫中山在上海召開國民黨會議，才最後決定興師討袁，發動「二次革命」。柏文蔚「當時意志消沉，未到上海參加」。十二日李烈鈞奉孫中山命，由上海轉回江西，在湖口宣佈起義，組織討袁軍，發佈《討袁檄文》。為保民主權利的「二次革命」（又稱贛寧之役、癸丑之役）爆發了。

江西首先起義後，蘇、皖、粵、湘、川、閩各省先後回應獨立。七月十五日，黃興經孫中山等人「多方敦促，不得已，出為犧牲以全黨誼」，勉強去南京逼江蘇都督程德全獨立，自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並敦促留在南京的柏文蔚接受安徽討袁軍總司令的委任狀。孫中山在促令各地急起回應外，一再致電袁世凱，敦促其辭職，若「必欲殘民以逞，善言不入……必以前此反對君主專制之決心」，堅決征討之，「義無反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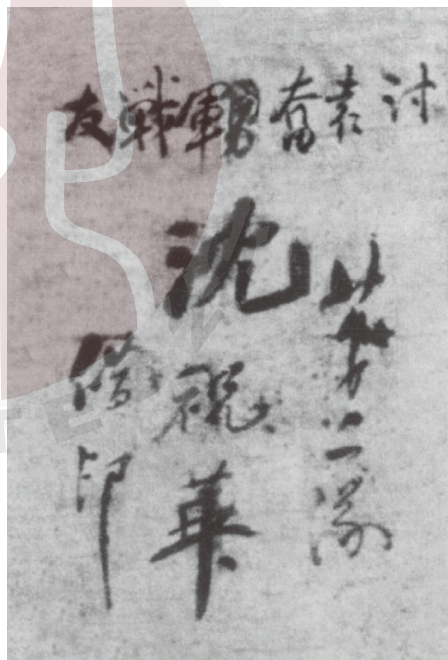
袁世凱派三路大軍南下：第一路為段芝貴部，由京漢線南下進攻江西；第二路為馮國璋部，以張勳為先鋒由津浦路直攻南京；第三路為倪嗣沖部，由汴梁經潁州、正陽關及太湖攻安慶。討袁軍方面，武漢及九江上游由李烈鈞負責；津浦線方面由黃興負責；潁州、正陽關、太湖方面柏文蔚負責。是時湖南程潛部亦集中進窺武漢，使敵人不敢長驅東下。戰事並非絕對不可為的。

七月十八日廣東、安徽兩省宣佈獨立，二十日福建宣佈獨立，二十二日上海國民黨組織討袁軍，二十五日湖南宣佈獨立，八月四日重慶宣佈獨立。這些省份雖然宣佈獨立，但各省內

部意見不一。江蘇都督程德全、福建都督孫道仁、湖南都督譚延闓本身就主張獨立，只是迫於形勢，而不得不宣佈的；彼此之間互不統屬，沒有統一的領導與部署，大都缺乏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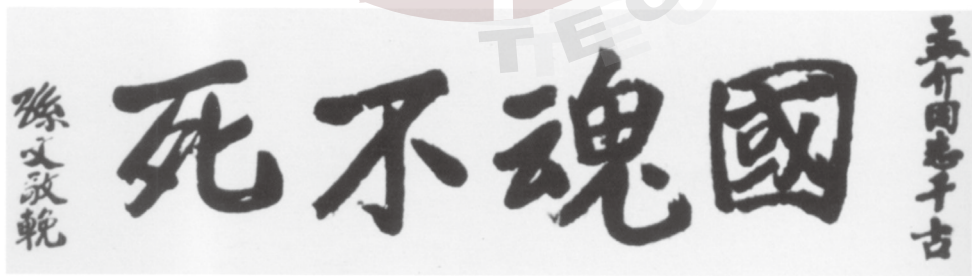
這月中下旬，孫中山多次發表宣言和通電，聲討袁世凱反對革命的種種罪行，闡明這次討袁鬥爭的正義性，堅決要求袁引咎辭職，否則，將以過去「反對君主專制之決心」來推翻他的反動統治，一定義無反顧。

但是，戰爭打響後，戰場的形勢對革命黨人非常不利。投入戰爭的各省革命軍隊，既是倉促上陣，又無統一的部署指揮，在咄咄逼人、攻勢猛烈的北洋軍隊進攻面前，明顯處於劣勢。另外，帝國主義者又積極支持袁世凱。德國還派了軍官，出動了軍艦，幫助北洋軍作戰。至於國民黨，原本就缺乏討袁的決心和準備，這時更加處於渙散的狀態。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去廣泛地發動和組織群眾投入這次革命戰爭。所以，南方各省討袁軍同實力比自己強的北洋軍一交火，就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難以招架北洋軍的反撲。七月二十五日湖口失陷，八月十八日南昌失陷。黃興於七月二十九日由於前方兵敗而出走。九月一日，南京被依附袁世凱



討袁軍的胸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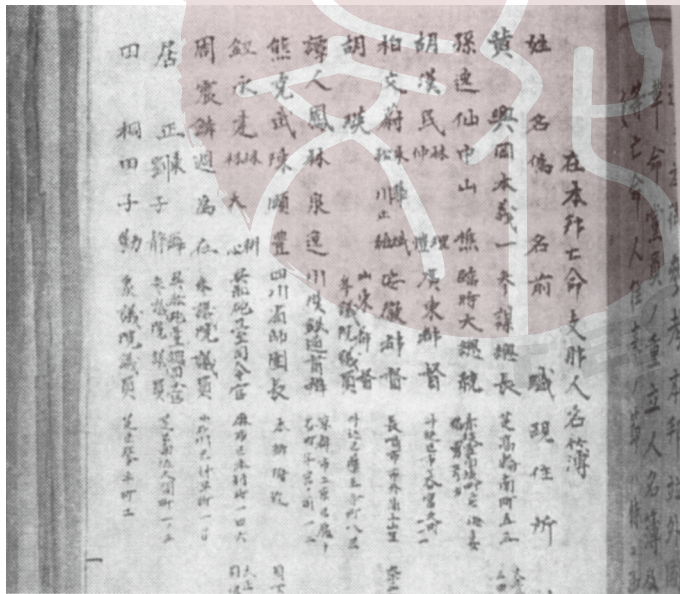
的封建軍閥張勳攻陷。其他獨立各省份情況更差：上海方面組織起來的討袁軍不久瓦解；江蘇都督程德全在宣佈獨立後便溜往蘇州，通電反對討袁；八月六日安徽師長胡萬泰被袁世凱收買倒戈，宣佈取消獨立；八月九日，福建取消獨立。八月十二日、九月十二日，湖南、四川也先後宣佈取消獨立，先後一一陷落軍閥之手。至此，「二次革命」從起兵不到兩個月就完全失敗了。資產階級革命派掌握的地方政權全部喪失，北洋軍閥勢力則進一步擴張到整個長江流域。「二次革命」雖然是孫中山發動的一次武裝反袁鬥爭，是維護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的一次努力，但是宣佈獨立的七省打算不同，行為不統一，有的動搖妥協，投機觀望，先後宣佈取消獨立；有的內部分歧，渙散無力，很快瓦解。特別是國民黨已放棄了同盟會在辛亥革命前的革命綱領，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擁護。而帝國主義卻在政治經濟各方面全力支持袁世凱，進步黨和舊官僚對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又大賣力氣，在國會中通過「討伐」案。所有這一切主客觀原因，造成了「二次革命」的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黃興等人逃亡國外。他們在自己締造的「中華民國」裡，連立足之地也不存在了。



孫中山為「二次革命」中殉難的安徽討袁軍第一支隊長張匯滔（字孟介）寫的挽幛。

一九一三年的討袁戰鬥，孫中山等人所謂的「二次革命」（史稱「癸丑三役」，又稱「贛寧之役」），雖然遠遠說不上是真正的革命，沒有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但它是民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南北戰爭，是維護民主共和國的第一次武裝反袁鬥爭，實際上可以說是辛亥革命的繼續。曾幾何時，領導過二次偉大的辛亥革命，在亞洲第一個建立共和制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遭到了徹底失敗。袁世凱的武力統一政策一時取得了成功。除桂、黔、川、滇四省尚為地方軍閥盤踞外，南方其他各省都成了北洋軍及其附庸的征服地。全國進入了北洋軍閥最黑暗的統治時期。

「二次革命」是孫中山策動和組織的，他重新舉起革命民主派的旗幟，「為鞏固共和戰，為表示國民反對專制戰」。這是保衛辛亥革命的成果，抵抗北洋軍閥反革命暴力鎮壓的義戰。從這個意義上說，「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繼續。任何革命都不能一下子就取得最後勝利，往往第一次革命成功，至少要第二次革命勝利來



日本警方掌握的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人名單（局部）。

鞏固。可惜，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由於革命已經退潮，國民黨的渙散瓦解，黨員脫離領袖，階級脫離政黨，政黨嚴重脫離群眾，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袁世凱武力進攻面前，慘遭失敗。這次鬥爭的失敗，標誌著辛亥革命的最後失敗。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親歷者何遂在回憶錄中反映他那時痛苦的心情：「我們一行人出發東渡了。當輪船緩緩地開出吳淞口外，我回首望苦難深重的祖國，依然風雨如晦。多少年夢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這樣失敗了。」³⁵這不也正是民國的締造者竟在民國無立足之地的孫中山的心情嗎？

不過，從孫中山個人來說，自他就任臨時大總統到二次革命失敗的這段時間，是他革命生涯中經歷複雜、大起大落的一個階段，既有勝利的喜悅，也有失敗的懊惱。在這期間，他曾有過事後令他痛悔不已的「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將臨時政府的領導權讓給了袁世凱。以後又埋頭實業建設，對袁世凱建立獨裁政治的罪惡企圖，缺乏應有的警惕，使革命再次遭受挫折。應該指出，由於主客觀的原因，一個人的一生之中，要一點不犯錯誤幾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領導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難免會有些失誤，問題在於一旦發現自己犯了錯誤，能否及時醒悟和糾正。孫中山的偉大，正是體現在他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敢於正視錯誤，能夠不斷地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改正缺點，堅持不懈地為實現自己明確的革命目標勇往直前。」宋

案」發生後，他是革命陣營中，第一個從對袁世凱的幻想中清醒過來的，又第一個提出了武力討袁的正確主張。在「二次革命」失敗後，雖然革命陣營內部瀰漫著一片失敗的情緒，但孫中山仍毫不氣餒，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他很快就號召革命黨人，「既不可以失敗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難而縮步。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惡消長之天理，則終有最後成功之一日」，表現了一個革命者奮鬥不息的偉大氣魄。

三、成立中華革命黨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黃興因戰事失敗，南京取消獨立。八月二日，孫中山偕胡漢民乘輪離開上海，希望前往廣東堅持戰鬥。但廣東內部不穩，廣東都督陳炯明派人於半道勸阻，孫中山被迫轉道再次流亡日本。

「二次革命」失敗後，同年十一月，袁世凱悍然下令解散國民黨，革命黨在國內已無法進行合法活動，一時無力再舉義旗。戰敗亡命的革命黨人，一些不堅定的懾於袁世凱淫威，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在國內者脫離黨籍，轉投他黨或賣身於袁世凱；逃亡國外者受不了困苦顛連，變志他圖。以黃興為代表的一部分革命者，雖然仍要反袁，但認為目前袁勢高漲，須暫時忍耐，伺機再動，但言十年後再圖革命。這種思潮在流亡者中很有影響。總之，他們的處境十分困窘，反袁慘敗給他們心理上罩上了一層厚厚的陰雲。

當時的情形，正如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宣言》中所述：革命黨人「意見分歧，或緘口

不談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種種灰心，互相詬誶」。³⁶但是，面對著垂頭喪氣的革命黨人和中外反動勢力，孫中山毫不氣餒，對革命前途仍充滿信心。他耐心地鼓勵革命黨人振作起來，恢復同盟會時期百折不撓、屢仆屢起的革命精神，繼續為革命事業而奮鬥。

這年年底，孫中山又專函通告南洋的革命黨人，鼓起勇氣，再往直前，並慨然表示：作為革命者「雖石爛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敗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難而縮步」，只要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惡消長之天理，則終有最後成功之一日」。³⁷他眼光遠大，信心百倍，堅定地認為，即使己身一生不能完成革命，四億中國人民也必然會聞風興起，把革命偉業進行到徹底勝利。

在如何度過當前困難，去迎接勝利的問題上，孫中山對辛亥革命的道路進行了反思。他認為最大的教訓是缺乏一個足以擔當革命征途的政黨。他說：「曩同盟會、國民黨之組織，徒憑主義號召同志，但求主義之相同，不計品流之純糅。故當時黨員雖眾，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分歧，步驟凌亂，既無團結自治之精神，復無奉令承教之美德，致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迨夫外侮之來，立見摧敗，患難之際，疏如路人。」基於這種情況，他決志「糾合同志，宣立誓約，組織機關，再圖革命。斬以犧牲之精神，盡救國之天職」。就是說，要組織一個有統一意志、嚴格紀律、堅持革命的政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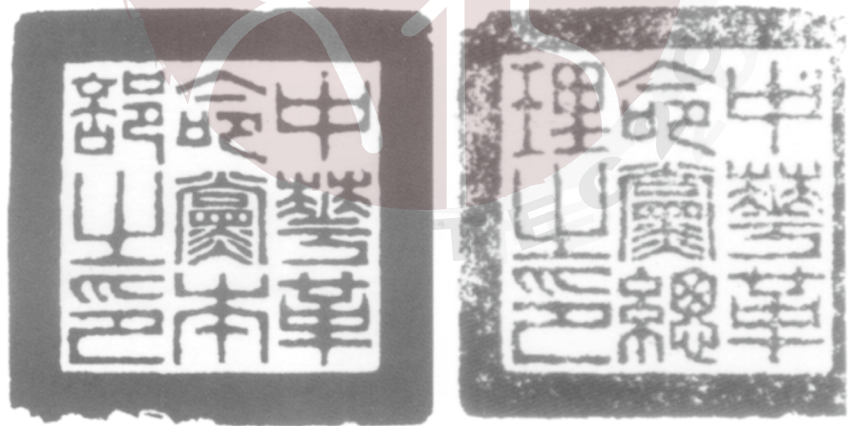
36 《中華革命黨宣言》，黃季陸編：《總理全集》中冊，「宣言」，成都近芬書屋一九四四年版，第十八頁。

37 鄧澤為編：《孫中山先生二十年來手札》卷二，廣州述志公司一九二七年影印版。

從此以後，孫中山為了奪取勝利，又開始了艱苦的鬥爭歷程。他對「二次革命」的失敗進行了反思和總結。鑒於國民黨的複雜、渙散，沒有戰鬥力，孫中山召集流亡東京的部分革命黨人，總結經驗，檢討得失，計畫集結革命力量，策劃「三次革命」。他認為，繼續開展革命的首要一著，就是要建立一個比國民黨純潔的、有信仰、有紀律的新黨，而後才能重振旗鼓進行革命。

一九一三年九月，孫中山在日本開始籌備組織政黨的工作。經過半年多的積極籌畫，建立新黨的工作基本完成。

中華革命黨突出「革命」二字，是孫中山身處逆境而革命精神仍然昂揚的表現。一九〇三年，孫中山在保皇黨勢焰披猖、必須奮起爭奪檀香山陣地時，曾將重建的革命組織取名「中華革命軍」；同盟會成立時，孫中山曾提議在同盟會之前冠以「革命」二字；一九〇八年，同盟會內部鬧分裂，



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孫中山在東京主持召開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擔任總理。圖為中華革命黨本部之印和總理之印。

他又曾憤而準備另組「中華革命黨」以取代渙散的同盟會。到此時，正式以此命名新黨，其目的就是鑒於袁世凱「將撥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負托」；而國民黨已四分五裂，再無法承擔反袁重任，因而寄望於新建的黨，以揚辛亥革命時期推翻清朝封建專制政府的精神，以「雪癸丑之恥，竟辛亥革命之功」。無疑，這是必要的、正確的。它顯示了孫中山對既定革命目標的堅定不移和為它的實現而百折不撓的革命意志。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即許多革命黨人還在國內奮鬥或在亡命途中，逃亡海外黨人也喘息未定之際，孫中山就在東京吸收了第一批黨員，他們只有五個人，即：王統、黃元秀、朱卓文、陸惠生、馬素。一九一三年十月，陳其美、戴季陶等二十二人在東京宣誓入黨，張人傑（靜江）、蔣介石在上海宣誓入黨；十一月，鄧鏗等五十七人，十二月，夏重民等一百一十三人在東京入黨，陳德出等六人在大連入黨。途經日本赴美的林森及海外人士也陸續入黨。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東京召開了中華革命黨第一次黨員大會，到會者有八省逃亡日本的黨



一九一四年孫中山在日本留影。

人，孫中山被選為總理。七月八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築地精養軒召開成立大會，正式宣告成立。到會者三百餘人。孫中山在會上宣誓加盟，正式就任總理職務。並發佈《中華革命黨成立通告》，號召黨員「協力同心，共圖三次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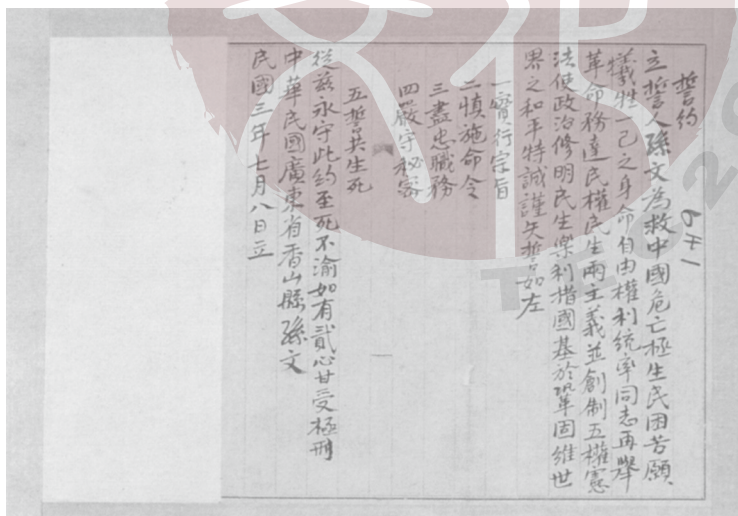
接著，他公佈了手書的《中華革命黨總章》，規定黨的宗旨為「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並以反袁作為革命的目標。在憲法頒佈前，「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黨員完全負責」。並規定按入黨時間的先後，將黨員分為首義、協助和普通三種，各有不同的政治權利，即在起義以後到憲法頒佈的時期內，首義黨員有參政執政的優先權利，協助黨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普通黨員只有選舉權。入黨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紙，絕對服從總理。他要以自己為中心建立一個絕對服從自己指揮的戰鬥的黨，最終為在中國建立五權憲法的民主國家開闢道路。許多革命黨人因反對這個規定而拒絕加入。

中華革命黨本部之組織，分為總務、黨務、財政、軍事和政治五部，總務部長為陳其美，黨務部長為居正，軍務部正副部長為許崇智、鄧鏗，政治部正副部長為胡漢民、楊庶堪，財政部正副部長為張靜江、廖仲愷。設支部於國內外各地，國內支部專事組織武裝討袁，海外支部負責籌款。中華革命黨堅持武裝鬥爭，把在國內的軍事活動作為主要工作內容。

孫中山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力圖集中力量清除積弊，重組新黨，再舉革命，當然是正確的。但是，他沒有把袁世凱的反動和他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基礎聯繫起來，沒有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中國人民最主要的敵人，因而把政治綱領和鬥爭目標僅僅局限

限在「反袁」和實現「共和」這種比較表面的層次上，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徹底綱領。在當時民族危機深重（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的情況下，僅僅把鬥爭局限於「反袁」，只是為了恢復辛亥革命以後建立起來的那種極不徹底的「共和」制度，就會掩沒了救亡的旗幟，把真正的民族敵人——帝國主義輕輕地放過去了。而帝國主義利用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不敢反帝的弱點，不遺餘力地支持袁世凱政府繼續鎮壓革命運動，使得革命黨人的鬥爭處處慘遭失敗。

特別是在組織工作中有嚴重缺點，建黨所執行的組織要求和辦法，充滿封建行幫結社的氣息，而缺少革命政黨的活力。比如，錯誤地按入黨時間先後，在黨員中劃分三種等級，並各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的規定，使黨員脫離普通群眾，形成特殊階層。又比如，要入黨者宣誓服從孫中山個人，並為強調要依靠對他一人的忠誠，而採取了在誓約上加按指模等形式主義的手段，顯然是違背了自由、平等的原則，



孫中山加入中華革命黨的誓約書。

近似專制的家長制。這些都與孫中山所主張的自由平等精神相違背。

黃興對此提出異議，希望孫中山改正要求黨員在誓約上按指模的做法，而且不要「以權利相號召」，不要依據入黨先後，把黨員分成「首義」、「協助」、「普通」三等，分別定為「元勳」、「有功」、「先進」公民。許多革命黨人對孫中山的組黨主張提出了不同意見，對孫中山擬草的章程提出了修改意見。黃興曾勸告孫中山：誓約上「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詞和蓋指模一事，「前者不夠平等，後者跡近侮辱」，懇切地期望糾正過來。

孫中山仍然堅持己見。六月三日，孫中山在給黃興的信中又說：「弟終以為欲建設一完善民國，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以既異，不肯附從，以再圖第三次之革命，則弟甚望兄能靜養兩年，俾弟一試吾法。若兄分途並進，以行暗殺，則殊礙吾事也……此後彼此萬不談公事，但私交上兄實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間之也。」

戰友間的不和，既是自我損耗的開始，也是敵人進攻的良機。正直的革命黨人十分憂傷，日本友人也為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多次奔走調停，但都沒有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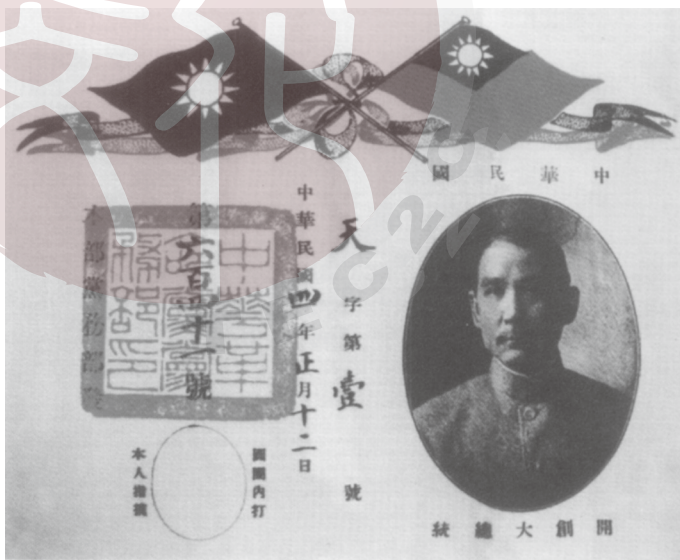
萱野長知在《中華民國革命秘笈》一書中寫道：「孫中山提議組織絕對服從領袖的黨，黃興則反對領袖專政，他們之間發生了衝突。萱野想調停一下矛盾，跟孫中山一齊訪問黃興，那時黃興一步也不相讓，兩人感情所激，有時高聲驚動四壁。晚餐後再激論，直至夜深，爭論最後幾乎變為爭吵而破裂。」

篤實的黃興，是「一個黨一個領袖」論者。他始終認為中國革命黨只有一個領袖，領袖

就是孫中山。但當孫中山主張中華革命黨只有一個「黨魁」，黨員必須絕對服從「黨魁」的時候，反對最力的又是黃興自己。

黃興致函孫中山，陳述整頓黨務意見說：「若徒以人為治，慕袁氏之所為，竊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後，況更以權利相號召乎？……弟竊思以後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個人之天職，非為一公司之權利可相讓渡可能包辦者比。」他建議「從根本上做去」，認真總結，分清是非，「盡披露於國民之前，庶吾黨之信用漸次可以恢復。又宜寬宏其量，受壤納流，使異黨之有愛國之心者有所歸向。夫然後合吾黨堅忍不拔之士，……組織幹部，計畫久遠，分道進行，事有不統一者未之有也」。不能不承認，黃興的批評與建議，有許多是合理的。

其結果，使這個新黨成為具有宗派色彩的人數寥寥的小團體。據中華革命黨原始黨員名冊的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一三年九月至一九一四年七月，黨員僅有六百九十二人，嚴重地脫



中華革命黨黨證。

離了人民群眾。正像孫中山後來總結改建中華革命黨的教訓時所說：「從前在日本，曾經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辦法。」³⁸

孫中山通過總結「二次革命」

的失敗，進一步明確了掌握軍隊的重要，他指出：「國事未定，則吾人須有不可侮之實力，質言之，即是武力」；要「以武力去彼（按：

指袁世凱）兇殘」。³⁹中華革命黨本部組成後，孫中山著重抓武裝鬥爭的工作，同年九月，他仿照一九〇五年親自為同盟會制定軍事規章辦法，又親自為中華革命黨擬定了《革命方略》，並花費兩個半月的時間同廖仲愷、胡漢民、田桐、居正等討論群組織革命軍等問題。但他實際上又沒有去組織軍隊，反袁的主要方式是採取局部暴動。一九一四年在江蘇南通、奉天本溪、浙江杭州和廣東惠州、增城、博羅、廣州等地的起義，都是屬於利用「少數人之激烈心理，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孫中山在東京留影。

38 《列寧逝世演說》，《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五百三十六頁。

39 《致鄧澤如及南洋同志書》，載鄧澤如編：《孫中山先生年來手札》卷三，廣州述志公司一九二七年印版。

逞一時之憤，或一部之力」的小暴動，故「終歸無效，徒自滅殺其勢力」。40

一九一五年夏末，孫中山舉行了本部各部長會議，決定組織中華革命軍，先後派出了各省區的軍事負責人，並令陳其美、居正、胡漢民、于右任分別組成中華革命軍東南軍（上海）、東北軍（青島）、西南軍（廣州）、西北軍（陝西三原）四個總司令部，分派幹部到江蘇、浙江、廣東、山東、陝西等地區去組織反袁鬥爭。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中華革命黨在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鬥爭中是比較堅決的力量，也積極組織了一些小規模的武裝鬥爭，曾經一次接一次地點燃起反袁的烽火，百折不撓地進行堅決的艱苦奮戰。到一九一五年十月以後，反袁的武裝起義更進入高潮，上海、廣東、山東等地出現了不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英勇鬥爭事蹟。他們起到了當時反袁鬥爭的先鋒作用，喚醒人們為衝破袁世凱黑暗專制統治而起來鬥爭。不過，在這些反袁的實際行動中，這部分人的所謂軍事行動，也只是在各地聯絡舊軍隊，收買退伍軍人和土匪，組織暴動，或進行暗殺，也就是說系通過金錢的作用，「利用土匪，運動軍隊去打倒袁氏」，走的仍然是辛亥革命前不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單純軍事冒險的老路。所以，他們在反袁的鬥爭中雖仍很堅決，但先後在湖南、江蘇、浙江、廣東等省各地所組織的一些小規模的武裝起義沒有什麼大的成效，並均相繼以失敗告終。

儘管如此，中華革命黨雖由於主客觀不利因素，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但它仍算是一個全國性的民主政黨。從一九一四年四月至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孫中山共發出委任狀七十九次，受任幹部八百三十多人。黨員確數雖無統計，有人估算，起碼在兩三千人以上。南洋和歐美華聚居較多的大埠原國民黨支部，大都遵令改為中華革命黨支部，或者接受中華革命黨本部意旨辦事。初步統計，計有四十三個支部、一百六十四個分部。在內地，贛、粵、鄂、滇、蘇、豫、皖、陝、浙、桂、湘、甘、魯、東三省、黔、閩、川各省也先後建立了支部或分部。孫中山自稱該黨乃秘密結社性質，而非政黨，當系指結黨方式。而究其主義、綱領系承同盟會之緒，並補國民黨之不足，體現了民主革命的要求，更體現著反袁大方向，是當時唯一揭舉並堅持武裝反袁旗幟的政黨。而其成員有一定數量，分佈地區又相當廣，影響也較大，實際上已充當各地反袁鬥爭的先鋒。所以袁世凱把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人作為必須剷除的首敵，對內三令五申，厲行防範和鎮壓；對外反復交涉，不惜出賣國家主權，圖謀驅除和消滅革命黨人。

孫中山定的中華革命黨黨章，確實缺乏足以動員廣大群眾奮起反袁的內容，中華革命黨人也未能深入發動群眾。但是，這個黨綱畢竟恢復了同盟會原有而後被國民黨忽略的實現民權、民生主義的革命主張，制定了前所未有的詳盡的《革命方略》，這對於一些熱心民主革命的革命者是有吸引力的。一九一四年一月，湖南國民黨人鄒永成、王道於日本東京發起組織的以剷除專制、鞏固共和為宗旨的「民義社」，於七月在湖南郴縣舉事，失敗後其志未奪，集

體加入了中華革命黨。就是農民起義首領白朗，有如前述，也推崇孫中山，假孫中山名義號召群眾，並在自己的佈告中，痛斥「袁世凱狼子野心，以己意為法律，仍欲以帝制自為」，顯示了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所給予的民主革命影響和革命人民的一種思想趨向。

孫中山領導中華革命黨反對袁世凱的鬥爭，艱苦備嘗，一再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但是，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的武裝反袁鬥爭，在「二次革命」失敗後的中國大地上掀起一陣陣波瀾，帶動和推進了反袁鬥爭高潮的到來。

「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換得假共和。」辛亥革命前後的風暴颳起飄落，令人困惑不解，共和的精神在哪裡？怎樣才能取得勝利？革命的迭遭失敗，使孫中山經受了強烈的震動。



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孫中山與即將回國舉行反袁革命的同志合影於東京國民社。前排右起：田桐、廖仲愷、居正、胡漢民、孫中山、陳其美、許崇智、鄭鶴年、鄧鏗。